

从文化视角论交际教学法在中国的实施

张庆

(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从文化的角度,用丹麦学者 Hofstede 提出的三个文化价值维度“个人—集体主义”“权利距离”及“不确定性避免”来分析实际教学法在中国受挫的原因。笔者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它所隐含的西方文化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权利距离”及“高度避免不确定性”相冲突的结果。笔者也借此呼吁中国的语言学家及教师们能找到一条将交际教学法的主要原则与中国文化有效事例的道路,以促进其在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 外语教学 交际教学法 文化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7)01-0061-03

交际教学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简称 CLT)作为一种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西方兴起的语言教学思想取向,对外语教学的理论研究、大纲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及测试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传入中国以来,为中国沉闷而不尽人意的外语教学注入了生机,带来了可喜的改革和创新。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阻碍,其实施一度陷入困境。许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其在中国的可行性进行了有益的研究。笔者试图从文化视角对其在中国的实施进行评价。

一、交际教学法的理论基础及教学原则

交际教学法起源于英国语言学家 Hymes 所提出的“语言的本质之一是交际的手段”的理论。他认为语言教学所发展的是说话者的“交际能力”。Hymes 针对 Chomsky 的语言能力指出,说话者不仅应具有使其能说出语法正确的句子的抽象能力,还应具有在一个语言社区进行交际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即:“交际能力”。这种交际能力包括懂得所说的话是否(且在何种程度上)为 ①是符合语法的;②在应用中是可被人接受的;③在某种场合中是得体的;④是可被真正使用的^[1]。后来,Canale 和 Swain 又将这一概念具体细化为语法能力、社会语言学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2]。因此,交际教学法的目的及对教学的评估相应地应围绕以上四个方面。那么,在具体应用中,它所遵循的原则与以往的教学法,如:语法

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视听法等就完全不同。可将其概括如下:①学习是主动的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学的目的是为实现交际的目的而组织的。②学生和教师的角色发生了重大改变。学生是课堂的中心,他们不是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而是各种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教师不再是课堂的主宰,而只是教学活动的发起者、引导者、信息的提供者及教学活动及结果的评论者。③对错误的容忍和对流畅的重视。犯错误被认为是学习过程中的必然,是通向正确的不可逾越的过程。错误不应也不可能被否定和扼杀。错误会随着学习的深入和多次检验而被改正;流畅在表达中的作用是重要的,不要因微小错误而影响语言表达的流畅性^[3]。

二、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交际教学法在中国受挫的原因

1. 交际教学法在中国的引进及受挫

交际教学法的思想理论及原则很快就风靡了西方外语教学界,在理论研究、大纲设计、具体教学方法、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及测试上都取得了可喜的发展。这一教学方法很快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引进中国。中国的语言学者们期待它能为中国沉闷而不尽人意的外语教学带来光明的前景。语言学家们和语言教师们对其给予了莫大的热情和兴趣,以为从此为中国的外语教学找到了一劳永逸的方法。但该法在中国的推广和实施中,却遭到了不少挫折和困难,使其在中国的发展一度陷入困境。

有些外语教师甚至彻底放弃了该教学法,转而又回到诸如语法翻译法等老方法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困境?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方面对其在中国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而有益的研究,如中国具体的课程设置、教材体系、四六级考试体系、大班教学形式及教师口语水平等^[4-5]。但遗憾的是,很少有学者从文化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

2. 交际教学法实施中的中西文化冲突

作为一种在西方兴起的教学方法,交际教学法毋庸置疑地在某种程度上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因为文化对社会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就像 Edward T. Hall 所说的“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是可以逃离文化的影响的”^[6]。尽管文化的影响大部分是不被察觉的,它却是我们无形的老师。既然中国人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当产生于西方的交际教学法移民来中国后,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冲突。如果该教学法不能设法与中国的文化相折衷,它必将在实施中受到挫折。据此,必须充分关注交际教学法在中国实施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冲突。下文将用丹麦学者 Hofstede 的文化价值维度对该教学法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和研究。Hofstede 所提出的文化价值维度包括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权利距离维度、不确定性避免维度及男性—女性维度^[7]。因为最后一个维度与交际教学法联系甚微,故本文将着力于前三个维度的研究。

(1) 学生角色转换中所表现的“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冲突

交际教学法的目的是发展学生的交际能力,几乎所有的教学活动都是围绕这个目的而进行的。为此,必须要求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具有充分的主动性,因为只有学习者感觉自己能用所学的语言“做”某件事时,才会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所以,学生应成为外语学习的主宰者和课堂教学的中心,其角色是作为自我、学习过程和学习目的的协调者。应鼓励学生充分使用目标语自由、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在公开进行口语表达及角色活动和小组活动时,往往要求学生公开地表述自己的情感及个人经历。事实上,为了激发学生尽量多用目标语,交际法课堂上尽可能地要激发更多的讨论、竞争、异议、甚至辩论。但实践证明,学习者主动而独立的角色转换却是交际课堂中最难的一点。中国学生往往表现为谦逊的、恭敬的、被动的听众,即使被教师要求,不得不回答问题和发表评论时,他们也羞于开口。这使得许多教师感到非常为难,甚至很沮丧。如果学习者缺乏交际的动机,又如何做到用目标语交流,如何培养他们的交际能力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

尴尬的现象?用 Hofstede 的三个文化价值维度之一“个人—集体主义”维度来分析,不难找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据丹麦学者 Hofstede 的研究,“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对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具有深远的影响^[7]。个人主义提倡个人的兴趣和发展极为重要,所有的价值、权利及义务都起源于个人。它强调自我表达、自我依靠、自我激励、个人创新及发展。这种原则与交际教学法要求具有竞争性的、独立的学习者的要求不谋而合。众所周知,个人主义价值观是西方文化的最重要特点之一,这就无怪乎交际教学法能在西方外语界盛行了。相反的,在中国等东方国家,其文化所遵循的却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强调“我们”的意识:个人身份依赖于社会团体;个人在情感上依赖于组织和集体;集体往往干涉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中国的外语课堂中,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无处不在。学生们在课堂上羞于启齿,因为从中国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看来,说得太多是骄傲自满和肤浅的表现。如果一个学生在课堂上显得太过突出和活跃,他会被认为太自以为是和缺乏集体主义,从而被其同学所疏远。因此,在中国外语课堂上,即使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也保持沉默,只是等待和观望。他们认为如果讲得太多和讲得太好,就会被认为是炫耀,而如果讲得不好或犯了错误,就很扫面子,而且会被老师责备。当然,如果想在中国课堂上激发激烈的讨论和辩论,那将是难上加难,因为集体主义强调团体间的和谐和避免人际间的明显冲突。尖锐的批评和不同的声音往往被认为是非常不礼貌和不合适的。

(2) 教师角色转换中表现出的“权利距离”价值观冲突

交际教学法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学生和教师角色的转换。与传统外语教学不同,交际法强调学生的作用。学习者被认为是其学习过程的主宰者和积极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知识接受者。他们的情感和需求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肯定,教学过程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一系列活动。教材的选定是以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和促进其交际能力为目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实践和应用目标语。相应的,教师的作用比起教师为中心的传统课堂明显减轻了许多。他不再是课堂的主宰,而只是课堂活动的发起者,信息的咨询者及学习过程的协调者。事实上,就像 Corder 明确提出的“外语教师真正能做到的不是教授学生某一种语言,而是创造一种尽可能促进用该语言进行交际的和谐的环境”^[8]。学生和教师的关系是朋友和同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但这种

观念却大大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教师的认识。中国人对教师给予了极大的尊重,认为他们是社会中受人尊敬的成员。他们认为教师是博学和知识的象征。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教师不仅仅是一种社会阶层和职业,而是被赋予了莫大的尊重和敬意。当教师走进教室或与学生说话时学生必须起立,以表示敬意。公开不同意或反对教师的意见往往被认为是大大的不敬。Hofstede 的“权利距离”价值维度为这一中国文化特点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根据 Hofstede 的理论,另一价值维度——“权利距离”对不同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维度表明在何种程度下某一社会的人们承认和接受权利在人际关系中、社团及组织中是不平等地分配于个人的。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权利距离的国家,极大的尊重和敬畏被赋予给了诸如年长者、政府官员、老师等权威。既然教师被认为是权威,那么他就理所当然地应站在教室的讲台前对学生们传授知识,他就理应被认为能回答学生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因此,在交际法课堂上,当教师把大部分的时间和机会留给学生,让他们自主地组织学习时,许多中国学生会感到无所适从。更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当学生问教师问题时,教师居然说:“我也不是很清楚,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或“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些有关信息”。在学生的观念中,教师就应该占据大部分的课堂时间,对学生传授知识,而学生的任务则是记下他所说的话。如果一个教师不这样做,而且还要和学生协商、讨论来解决问题,那他还是一个合格和受人尊重的教师吗?事实上,有意识地削弱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地位,从而为外语学习者创造更多的交际机会以促进其交际能力是交际课堂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如果这一点不被中国学生所理解、接受和实行,可想而知,交际教学法将在中国举步维艰。

(3) 交际教学法与“避免不确定性”价值观的冲突

另一个阻碍交际教学法在中国实施的文化价值因素是中国是一个“高度避免不确定性”的国家。所谓“不确定避免”,据 Hofstede 所述,是指在何种程度下,某种社会文化团体感觉被不确定和含糊的状态所威胁。高度避免不确定性的社会文化团体通过为其成员提供稳定性、制定规范的制度以及决不宽容离经叛道的思想和行为来尽可能地避免不确定性。我们不难发现该价值观在中国外语教学实践中的体现,那些被认为讲课出色的教师往往是那些明确地给出结构完整、信息冗长、版书明确的教师;学生在课堂上一旦犯错,教师就应马上指出和纠正;教师必须仔细批改学生的作业,明确指出其错误并给出

详细的解释;教学内容必须在课本上明确告知;答案往往必须是确定的和唯一的。这些信念与交际教学法所提倡的对待错误和流畅性的观念恰恰背道而驰。比起语言形式的准确性而言,交际教学法更注重意思表达的流畅性。因此,它提倡尽量避免直接纠正学习者的口语错误。因为犯错误是语言学习中不可避免的过程,是通向正确的不可逾越的阶段。错误不应也不可能被否定和扼杀。错误会随着学习的深入和多次检验而被改正。因此,它提倡学习者在学习过程的深入中自我发现并纠正错误,或者实行同伴纠错机制而不是由教师直接纠错。其实许多教师也已发现,尽管他们多次纠正学习者的某一错误,而学生却屡纠不改。究其原因,是因为学习者没有真正从自我认知上认识和自省这些错误。事实上,一个具有高度交际性的外语课堂,语言知识的传授、活动的开展及作业的批改等,都应该是教师与学生共同协调、共同参与的过程。教师不应将知识和答案直接给予学生,而应让学生主动地、积极地参与和管理自己的学习、自行探索和找寻答案。但如果某位教师与学生协商该如何开展某项教学活动,或者让学生自己或同伴批改作业,他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或至少是不负责任的教师。由此可知,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避免不确定性的国家,交际教学法的某些重要原则的推行是非常艰难的。

四、结 语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交际教学法兴起以来,其理论基础和主要原则已被中外外语教学界所广泛接受。其影响不仅对过去、现在,而且对将来的外语教学都将是持续的和深远的。但在其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推广中,总是争议、争论及挫折不断,没有一种具体的交际教学方法可以声称找到了一个可被广泛接受的令人满意的模式。这与中国具体的教学环境、课程设置、教材体系、考试体系、师资水平等有关。笔者试图从文化的视角考察交际教学法在中国实施中所遇到的困难。用丹麦学者 Hofstede 提出的三个文化价值维度分析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从而找出其在中国受挫的文化原因。虽然文化因素根植于某事物的内部,但某种文化却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不断融合中变化的。由不同的文化产生的冲突并非是毁灭性的,而应当被看作是创造性的,因为起源于某一文化的新事物一旦在另一种文化中找到被广泛接受的实施方式,将会大大促进该事物的发展。所以,中国的语言学者和教师们应当想方设法找到一条将 (下转第 76 页)

点,分析得出由于高等教育领域投入相对较多,而职业技术教育被忽视,致使我国的教育投资结构超前。由此引起人力资本供给结构与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产业结构派生出来的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结构不匹配,出现了‘技工荒’和‘知识失业’并存的局面。因此,为了缓解‘技工荒’、推动大学生就业、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和效益评价体系建设。因为人力资本结构会影响产业结构,高等教育对于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尤为重要。但发展高等教育一定要把握好度,不能过于超前,并且当前经费已不再是限制高等教育的约束条件,重要的是加强投入机制和效益评价体系建设,使现有水平的经费更加高效率的利用。

2)从政府财政投入、收费标准、入学机会、管理体制等制度方面来影响教育投资的数量和结构,引导整个社会的教育投资适度向职业技术教育倾斜,加强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队伍的建设,增加对设备、实训基地等方面的投入。

3)采取各种政策促使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制造业要向研发、营销两头延伸,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密集型行业。这样就会扩大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

4)引导人们转变就业观念,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尊重技术工人的氛围,提高‘蓝领’阶层的社会地位。

参考文献：

- [1] 李长安.教育资源虚耗、知识型失业凸显我国产业结构缺陷[N].上海证券报,2006-09-18.
- [2] 蔡 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和发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146-161.
- [3] 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5):1002-1037.
- [4]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
- [5] MANKIW N G, DAVID R, DAVID W.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2):407-437.
- [6] BARRO R J.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M]. Cambridge: MIT Press,1997.
- [7] 郭继强.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构分析[J].经济学,2005,4(3):689-705.
- [8]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2006.
- [9] 徐颂陶.培养高技能人才有赖于职业教育[N].中国政协报,2007-02-25.
- [10] 郭俊峰.哈尔滨市职业教育热招背后暴露隐忧[N].黑龙江日报,2006-11-16.
- [11] 张智敏,唐昌海,张炜.有效人力资本对劳动力结构性演进的影响[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2):9-17.
- [12] 转引自俞培果,沈云.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3(10):86-90.

(上接第 63 页)交际教学法的主要原则与中国文化有效融合的道路,以促进其在中国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BRUMFIT C J, JOHNSON K.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1-26.
- [2] CANALE M, SWAIN M.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J]. Applied Linguistics,1980(1):1-47.
- [3] 郑仰南.交际教学法述评[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67-68.
- [4] 戴曼纯.关于交际语言教学法的几个常见错误观念和误解[J].外语教学,1997(4):40-43.
- [5] 朱以迦.对交际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受挫的反思[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4):41-45.
- [6] HALL E T. Beyond culture[M].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1976:79.
- [7] SAMOVAR L A, PORTER R 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5:88-92.

- [8] CORDER S P. Linguistic insights in applied linguistics[M]. Didier: AIMAV,1974:36.

